



当鲁迅遇见高尔基：

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学对话

□徐 静

2025年9月，第38届莫斯科国际书展的穹顶下，两束光柱穿透时空的帷幕，分别照亮了鲁迅和高尔基的身影，他们仿佛在时光的光影里进行一场跨越国界、时代与文化的对话。此前，“大师对话：当鲁迅遇见高尔基”展览在浙江文学馆开展。时隔三个月，展览又漂洋过海来到俄罗斯，让这场对话最终从想象变成了现实。

作为浙江文学馆策展团队，我们深知此次展览的使命：运用创新的叙事方式使经典文学“活”在当下，通过手稿、书信、出版物、多媒体等展览语言，让观众在时空交错中与两位大师产生思想的碰撞。这不仅仅是一次展览策划，也是对人类共同精神追求的深刻追寻。

从“对立”到“共鸣”的叙事重构

传统的东西方文学对比展览，大多停留在“差异”的层面上。经过大量的资料阅读及头脑风暴，最终我们将本次展览的核心理念确定为：打破地域与文化的界限，发掘鲁迅和高尔基作为“时代书写者”“人民代言人”的共同文学精神。

为此，我们提出“三重对话”主题：

第一重，思想对话——鲁迅的“立人”思想和高尔基的“底层关怀”。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认为人在精神觉醒之后才能做任何事；高尔基在小说《母亲》中用工人革命的故事来表现集体力量的觉醒。两者看似路径不同，实则都指向对“人”的解放。

第二重，艺术对话——鲁迅的杂文锋芒和高尔基的小说史诗。鲁迅的杂文是匕首投枪，直刺社会病灶；高尔基的小说用宏大的叙事描绘时代画卷。两者内容有别，却都以现实主义为底色，用文学反映现实。

第三重，命运对话——两位大师在革命浪潮中做出的选择与坚守。鲁迅一生坚持“为人生而艺术”；高尔基从流浪者成长为革命的“精神导师”，从未放弃对人性复杂性的刻画。他们的选择折射出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民族担当。

在具体策展中，我们一改以往以“物”证史，尝试构建沉浸式叙事空间。展览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间轴，采用“主题场景化”的方式来布置。依靠八组核心展区，将展品、多媒体装置、空间设计融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可触摸的文学史”。

在“铁屋中的呐喊”展区，我们以鲁迅《呐喊（自序）》手稿照片，配以高尔基的俄文手稿照片。手稿周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俄社会的老照片：北京的胡同、圣彼得堡的工厂、饥荒中的农民、游行的革命队伍。声光效果模拟出“铁屋”的压抑感，低沉的钟声、模糊的喘息声、远处隐约的呐喊。当观众走近时，影像中鲁迅的“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和高尔基的“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交替出现，在光影碰撞中产生思想的碰撞。

在“母亲与故乡”展区，高尔基《母亲》初版书和鲁迅《朝花夕拾》中的《故乡》手稿照片并置。展区版面上，鲁迅手稿照片旁边放着母亲鲁瑞的旧照，高尔基初版书旁边陈列着他母亲的照片——两位母亲都穿着朴素的布衣，神态从容镇定。



2025年，笔者在整理萧三家属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一批文学资料时，发现了一封抬头、落款均为英文的书信。阅读信件内容及查阅已有资料，结合笔迹、信纸批号等信息，可以确认这是1979年罗章龙（罗仲言）致萧三的亲笔信。萧三、罗章龙与毛泽东是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的同窗好友，彼此感情深厚，青年时代曾携手投身中国革命，两人均是毛泽东参与发起的新民学会的最初成员。1979年，两人都已年届八十，虽“靡颜老矣”，但仍关心时事，笔耕不辍。这封新发现的信件记录了他们在文学活动上的一些情况，也勾连起二人早年间的人事，具有较强的史料价值，值得仔细解读。除此之外，书信雅正的措辞与真挚的情感，亦十分动人。现将全信内容抄录如下：

Emi Evo：

阅人民日报十一期看到您俩写的：“幻想和现实”情文并茂，令人神往，仿佛重读 Goethe: Dichtung und Wahrheit*，感到欣慰！

上周又奉到二画，获悉近周参加四次文大会情况，精神极佳，良慰于怀。

亢斋汗漫游诗话与新民学会回忆兄不吝指正多处，足见兄长护我情深，感谢之至。

此等文字均属过眼浮云，未合时宜，兄如认为尚有可看之处，以后当将亢斋：《大革命时代史诗》一来抄写呈政，以博一粲。

庄生云：“日月出矣，燭火不息”，此之谓也。

朔风正厉，诸维珍摄，盼便中时赐箴言与教诲示我周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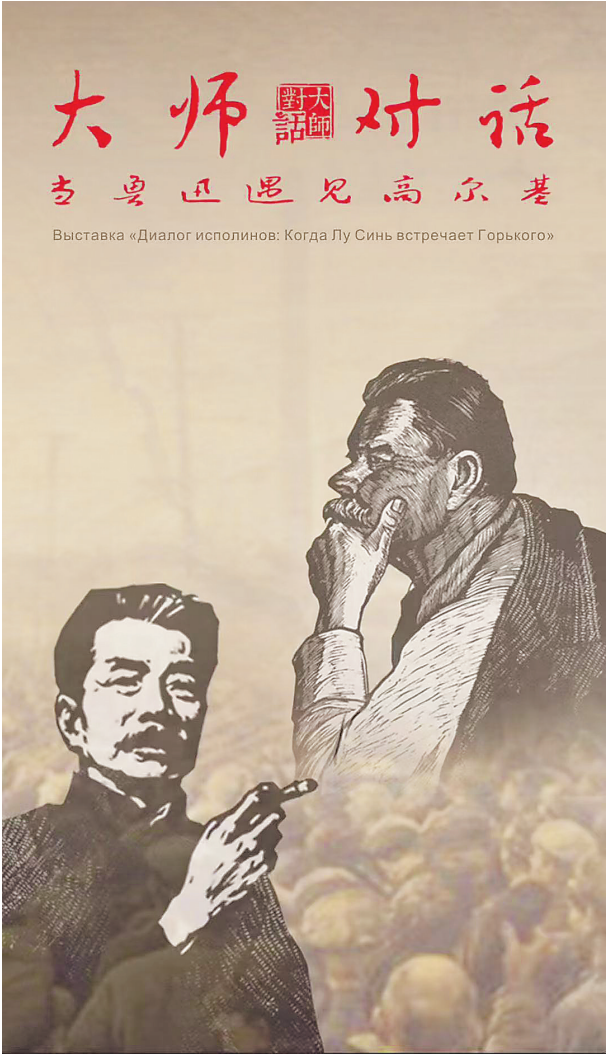
敬问

双安！

Leo Dragoner
79.11.20晚

*为笔者添注，原信德语用红笔书写，中文意为“歌德《诗与真》”。

埃弥·萧（Emi Siao）是萧三的英文名，Evo则很可能是萧三夫人叶华的英文名耶娃（Eva）的笔误。Leo Dragoner此前虽未见，但从英文音、意的两重对应不难推断此系罗章龙的来信。Dragoner有龙之意，Leo则为姓氏罗的音译，早年均有出国经历且联系密切的二人对英文称呼



“大师对话：当鲁迅遇见高尔基”展览海报

这种打破了传统的“文物加解说牌”的叙事方式，让观众在空间中“行走”时，自然地走进两位大师的精神世界。

让展品“说话”的技术革命

鲁迅与高尔基的手稿是本次展览的重要展品。但纸质文物的脆弱性也限制了展示方式。鲁迅手稿纸张泛黄发脆，高尔基手稿墨迹部分模糊。因此，我们使用了数字显示屏技术，加以动态形式展示。观众可以近距离地看到作者笔锋的力度、墨水的晕染情况，甚至可以推测作家写作时的心境。

展览空间设计借鉴了中俄建筑的元素，形成“对比与融合”的视觉语言。主色调采用红黑对比，地面用两国传统纹样

铺设：鲁迅展区背景为土墙，高尔基展区背景为木质集装箱，中间过渡区是两者的拼接。这二者各自代表了旧时代乡土中国和工业革命时期的俄罗斯。“铁屋”“工厂”在鲁迅展区有黑色金属架构，昏暗灯光，墙上的影像里有《药》里的刑场、人血馒头、麻木的看客；高尔基展区有红色砖墙、机械齿轮，墙面上播放着《母亲》里工人秘密集会、印刷传单、与警察斗争的片段。两个展区之间用一条窄窄的通道连接起来，象征着两位大师同样走上了反抗道路。

两个主展区墙面用中俄文对照的形式嵌入“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两句话。墙面投影两位大师的形象，他们的形象随着观众行走逐渐重合，鲁迅的冷峻与高尔基的坚毅在光影中交融，最终变成一只展翅的海燕（高尔基的象征）和一只破窗的铁拳（鲁迅的象征）。

为打破“观众——展品”的单向关系，我们设计了两组互动装置，试图让观众成为“第三位大师”。在留言区，观众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即“如果生活在他们的时代，会写什么”。答案会留在展区内，形成当代人和大师之间的精神对话。

观众在展馆四楼的文学日历、文学之树虚拟场景里还可以了解到两位大师更多的人生经历及交集，也可根据选择生成个性化的“文学人格报告”，根据“文学推荐”阅读更多相关书籍等。“或许你像鲁迅一样，用文字刺向黑暗，但内心仍保留对光明的渴望。”诸如此类的语言装置增加了趣味性，也让观众明白文学并非高高在上，而是和每个人生活相关。

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学寻宝”

展览的成功，离不开策展团队对关键展品的征集。

我们面临三大挑战：鲁迅文物呈现很大的稀缺性，比如鲁迅手稿多藏于国内的六家鲁迅纪念馆，作为纸质类珍贵文物，调取运输皆非寻常；高尔基文物具有很强的地域限制，比如俄罗斯国立图书馆对高尔基手稿的出境审查很严格，特别是带有革命内容的文物；即使找到主题、时间、创作背景高度吻合的中俄文物，也要结合主题章节进行取舍。

策展团队按照“主题优先”的原则，放弃追求文物数量，转而精选能体现“对话”主题的展品。每件展品都配有“背景故事卡”，通过第一人称叙事，拉近观众与历史的距离。为此，我们还专门咨询了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吴晓都老师。

“革命的海燕”艺术装置呈现的同时，相关影片与书籍展示会引导观众更进一步走进高尔基的文学世界。高尔基撰写的《俄国文学史》与鲁迅著述的《中国小说史略》等文学史著作并列放置，增加观众对高尔基和鲁迅作为伟大作家的同时也是杰出文学史家的了解。

鲁迅和高尔基都高度重视民族优秀文学传统的传承：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勉励现代文艺家“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高尔基在1929年推动恢复了普希金参与创办的《文学报》，引领俄罗斯现代文学继续普希金的文学传统。展览图文对此有丰富的展示。

展览通过鲁迅的译本封面及文字展板展现鲁迅曾翻译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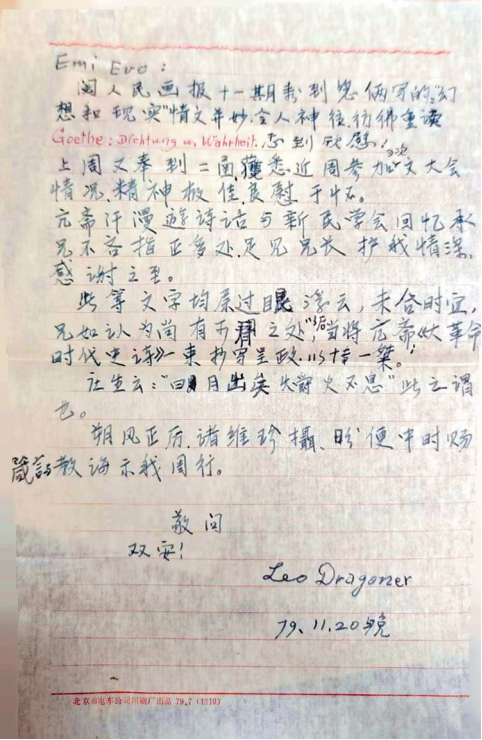
日月出矣，燭火不息

——1979年11月20日罗章龙致萧三的一封信

□韩 旭

自不必多说。《亢斋汗漫游诗话》自1979年开始发表于《湘江文艺》第11期，并一直连载到1981年，至少写了七篇。罗章龙在这些文章中除披露了毛泽东早年求学、交友的历史事实外，还记述了他与李达、石评梅、高君宇等人的交往，其中转述的一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如李大钊对陈独秀诗艺的评价也颇有价值。在馆藏的另一封1979年12月28日罗章龙致萧三的信中，罗章龙还写到“我近来生活杂乱无序，前呈诗话拙稿不妥处甚多。盼兄多批评赐教”。这里的前呈诗话”也应是“亢斋”系列的诗稿。“亢斋”全称“亢慕义斋”。现实所在地为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西斋，是当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及中共北方区劳动组合书记部办公处。“汗漫游”则典出《淮南子·道应训》，泛指远至天涯的逍遥漫游。罗章龙取这个名字，一是表明了诗话的历史特性，二也是想要表现青年时代作诗时意气风发、无拘无束的状态。之所以在信中说“此等文字均属过眼浮云”和“未合时宜”，既是一种谦辞，也确实感叹于岁月流逝，当年的人事如浮云般聚散，罗章龙萧三这一代人也迎来了“告别革命”的时代。

罗章龙信中特别提到的要“抄写呈政”萧三的“亢斋：《大革命时代史诗》一束”，应是指后来以《纪念大革命时期诸英烈诗》为题收入《椿园诗草》一书中的组诗，共58首。《椿园诗草》是罗章龙晚年出版的旧体诗诗集，按照作诗地点命名收录，有青年时代“见证历史”的旧作，也有晚年回忆、交游的新作，大多为叙事体裁，时间地点准确，因此具有较强的历史价值。《纪念大革命时期诸英烈诗》的首篇即是《忆守常》，追忆了自己在北京和李大钊共同发起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点滴，诗中提到的“沙滩东畔路”“伫望红楼路”显然是在当下的北京对过去自己在北京大学经历的回望，也符合1979年罗章龙调来北京后寻访旧友、故地重游的心境。这组诗大多是对牺牲的革命战友的追怀，不少直接以人名为题诗，如《伦克忠》《张春木》《怀向警予》《汪寿华》等，也收入罗章龙早年的旧作如1929年的《彭湃》、1931年的《悼代英》、1939年的《方志敏将军歌》等。罗章龙最初将其命名为“史诗”，



罗章龙致萧三信件手稿 中国现代文学馆 藏

或许并非出于题材的考量，而是取其所包含的英雄叙事、庄严历史之意，有立此存照的意味。至于“以博一粲”，自然也是谦辞。萧三看到这些记述故人的诗稿，倘若微笑，大概也是欣慰于一代革命者们为之献身的崇高目标终于成为现实。

信中提到的另一作品“新民学会回忆录”，后发表时题为《回忆新民学会》（由湖南到北京》），最初在《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10期上刊登，后收入中国革命博物馆和湖南省博物馆联合编纂的《新民学会资料》一书。该文不仅回忆了“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青年毛泽东和他的多次谈话内容、新民学会成立前后的活动情况，还首次提供了毛泽东在1918年春为罗章龙送行时所

尔基的《我的文学修养》《恶魔》和《俄罗斯的童话》的故事，并辅以文字说明。1930年，鲁迅便计划与郁达夫共同翻译《高尔基全集》，直至1934年9月至1935年4月，才根据日译本转译了《俄罗斯的童话》。高尔基去世后，《译文》杂志编辑黄源将德文版《高尔基全集》送给病重的鲁迅，希望作为其日、德文互译参考，但鲁迅四个月后逝世，《俄罗斯的童话》成为他翻译高尔基作品的绝笔。

多样的展览语言让展品不再只是简单展示的物品，它们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呈现出文学类展览特有的风采。

在共鸣中看见未来

莫斯科国际书展的数据让我们感受到来自观众的“温度”。这一场由俄罗斯数字发展与通讯传媒部、莫斯科市政府共同主办的文学盛会，自1977年创办以来就以深厚的历史底蕴、宏大的规模、广泛的国际参与度成为俄罗斯乃至东欧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此次书展共有722家参展商，浙江文学馆“大师对话：当鲁迅遇见高尔基”展览与参展出版机构共同形成了一幅五彩缤纷的文化图景。

书展留言墙上密密麻麻地贴满了观众的心声，它们表达出观众内心深处的触动和思考。

“原来鲁迅和高尔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人应该怎样活着？”这是一位22岁大学生的留言，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这两位文学巨匠的仰慕。在他看来，鲁迅与高尔基分属不同的国家、生于不同的时代，但他们的作品都触及了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这种跨越时空的共鸣，让他感受到文学的魅力。

“通过大师对话，我第一次感觉到经典文学离我不远。”这是一位15岁中学生真诚而简单的留言。这次书展用大师对话的形式把经典以亲切生动的方式展现出来，激发了年轻人对文学的兴趣和热爱，让他们意识到经典触手可及，与自己的生活紧密相连。

“大师对话：当鲁迅遇见高尔基”展览开幕时，文学馆曾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高尔基曾孙女Е. А. Пешкова、高尔基玄孙Т. М. Пешков等一行。他们给文学馆捐赠了珍贵的书籍，并在现场深情表示：“你们让我看到，文学不是书本上的字，而是能让人站起来的力量。”这句话，不仅是对展览的最高赞誉，更是对文学价值的深刻诠释。

本次展览以丰富的技术手段，让文学回归“人”的视角，告诉我们，经典可以通过创新的方式被重新解读，被赋予新的生命。互动装置、留言墙等参与式的展览模式，不仅增强了观众的体验感与归属感，更让文学以更加生动、鲜活的方式走进人们的生活。

事实上，这已经是浙江文学馆展览的“二度出海”。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对“人性与爱情”的共抒、鲁迅与高尔基对“社会变革”的共振，本质上都是人类共通情感的文化对话。未来我们还可以延续“双峰人物”策展逻辑，拓展至浙籍文人与其他国际文豪，形成系列化品牌，让那些被触动的灵魂、被点燃的思考，如同种子一般，在观众的心中生根发芽，继续生长。

（作者单位：浙江文学馆）

写的诗歌全文。同为新民学会的最早一批会员，罗章龙和萧三对保存有关史料都相当重视，曾担任萧三秘书的高陶老师新近捐赠的一批有关萧三的资料显示，早在1977年6月，萧三就把写作“新民学会”一章的任务交给了她。罗章龙信中所写的“不吝指正多处”，显然也是认为萧三同为历史亲历者之一，可以互相提醒，纠正文中一些因年代久远、记忆模糊而导致的错漏。

值得注意的是，罗章龙与萧三其实都是1896年生人，罗章龙仅比萧三小一个月，在往来书信中却始终以为极为谦和的姿态称呼萧三为“兄长”或“肖老”，并反复用典雅的文言辞令表示自己希望得到教诲。在1979年11月20日的这封信的末尾，他还援引《庄子·逍遥游》中的语句“日月出矣，燭火不息”来表示自己与萧三之间学识涵养的差距。罗章龙将萧三比为日月，自比为燭火，既有谦敬自抑之意，却也有“虽知己微，仍愿尽力”的执着与坚持不懈。“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激励罗章龙那一代“新青年”“只是向上走”的话语，在他们耄耋之年仍闪耀着不息的光芒。正如罗章龙在《椿园诗草》扉页题写的诗句“笔底波澜三百篇，殷忧二万八千天。漫山红叶秋容健，喜见黄花岁晚妍”，纵使已是“红叶”“黄花”，仍有一派明艳秋光——罗章龙仍在坚持写作，并始终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面对着人生。

罗章龙和萧三一样，既是早期“站在最前列”的革命者，也是同时受过中西、新旧教育，在传统文学与新文学的共同滋养下长大的民国知识分子。他们的书信往来仍保持着古代温润典雅的传统，寥寥几笔便可见学识与修养。岁月浮沉，故人飘零，但终其一生，二人也未曾改变对文学的热爱——罗章龙在“弄潮”之后更名罗仲言，成为先后执教多所名校的学者，萧三更是历经磨难也始终不改诗人的品格。通过解读这封四十余年前罗章龙写给萧三的书信，可以窥见二人从青年时代就结下的真挚友谊，也让我们对历史生出一份由衷的敬畏。“日月出矣，燭火不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阅读前辈的文字，何尝不是一种“赐箴言与教诲，示我周行”？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